

环境传播中的隐喻体系

——兼对2018年优秀生态环境宣传获奖文本的解读

王丽娜

摘要: 聚焦环境传播中的隐喻,遵循隐喻分析的方法,以生态环境部评选的2018年优秀生态环境宣传获奖文本为研究对象,本文识别并提炼出七个关键性的概念隐喻:绿色、战争、动物、疾病、死亡、家、国。同时,对这些环境隐喻的派生隐喻进行阐释,从中透视不同隐喻各自的环境意义生产及其环境价值。进而,引入元隐喻这个分析概念,对环境隐喻建构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解析。由此,认为环境传播中的隐喻实则是一个由元隐喻、根隐喻、派生隐喻等相互关联的隐喻共同搭建的隐喻体系。尝试用隐喻环这个全新的命题对环境隐喻体系的多层次性进行总结,以期促进环境修辞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发展。

关键词: 环境传播;概念隐喻;隐喻体系;隐喻环;生态环境宣传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443(2020)04-0044-15

项目基金: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YB2019062);云南大学一流大学创新团队项目(民族传播研究与媒体人类学)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4月15日,生态环境部发文公布了2018年优秀生态环境宣传产品的评选结果,共计评出33件(套)获奖作品。由于其中一些获奖作品是系列创作,涉及多个文本,因此这33件(套)作品实际包括409个文本(见附表)。应该说,无论是从议题的综合性(涉及雾霾、气候、塑料垃圾、垃圾分类、海洋污染、江河治理、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相关节日等各种议题),还是形式的多样性(包括海报、宣传片、微视频、微电影、手机H5、漫画、图书、戏剧等各种形式),以及来源的丰富性(制作主体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等方面考察,这些获奖作品在各种环境文本中都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而另一方面,按照官方的表述,这些获奖作品是“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载体”,能够积极地“引导公众关心、参与生态环境保护”^[1],由此可见,这些环境文本也是当下建构环保话语的重要方式。由于话语(discourse)是所有具有意义并且能对现实世界产生效果的表达、言辞、文本等的集合^[2],其陈述力量和认同力量需要借助于“通过语言或符号等象征手段来影响人们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3]的修辞实践的驱动与润滑,因此,修辞成了一个很好的,也是必要的分析上述优秀文本是如何建构环保话语的理论视角。事实上,在环境传播研究中,本来就存在着一个修辞学的向度。按照罗伯特·考克斯的界定,环境传播具有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两个面向。就功能主义维度而言,环境传播旨在教育、警示、说服并帮助人们解决环境问题;就建构主义维度而言,环境传播是社会运用符号进行的对环境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意义表述与争夺^[4]。而后一种取向正是一种修辞学的视野。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已进行过讨论,并将这种修辞学取向的环境传播称之为“环境修辞”^[5]。

当下,环境修辞已成为环境传播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图谱。针对不同的环境文本,研究

者提炼出诸如图像事件(image events)^[6]、环境情景剧(environmental melodrama)^[7]、天启叙事(apocalyptic narrative)^[4]、生态破坏演示(ecotage)^[4]、表演式抗争(performing resistance)^[8]、身体抗争(body resistance)^[9]、接合实践(articulation practice)^[10]等不同的修辞构造方式。但是,环境修辞在推陈出新并不断向一些时髦的理论话语靠拢的同时,似乎却把一个尽管不那么新颖,却长期占据修辞学重要知识维度的隐喻忽略了。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提出了“隐喻”(metaphor)概念。随着被誉为古典修辞学系统之作的《献给赫仁尼姆的修辞学》将辞格正式确立为修辞学“五艺”之一^①,辞格及其研究就一直是西方修辞学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修辞学被等同于辞格加以认识和看待。而尽管在辞格的知识范畴中存在着多种形式,但正如刘涛所言,源于隐喻较之于其他辞格所具有的难以比拟的修辞能力和劝服效力,隐喻不断对其他辞格进行着吸纳与收编,并逐渐成为“喻中之喻”,占据着“辞格中心”的位置^[11]。因此,考察上述获奖文本的修辞建构,显然不能缺失隐喻这样一个向度。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隐喻,并非指向一个简单的修辞命题,而是一个认知命题。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起,隐喻已开始从传统的技巧、艺术、文风等范畴中抽离出来,但真正认识到隐喻的认知本质的,还是认知语言学的创始人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二者指出,人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人类概念系统的构成与界定中伴有隐喻思维。隐喻便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12]。在此基础上,莱考夫进一步指出了隐喻的工作机制。这就是从作为喻体的源域(source domain)向作为本体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映射(mapping)^[13]。

由于概念是基于隐喻形成的,而“那些控制我们思想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种思维,它们还控制着我们的日常运转,深入到最平凡的细节……我们的概念体系在界定日常现实中起到核心作用”^[14],因此,隐喻也就同概念一样,成为现实社会的建构方式,规约着人们的思维与行动。这也是莱考夫和约翰逊会将隐喻称为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的原因。可见,隐喻的策略性使用能够建立起一个基于源域的某种特定意义的框架,进而使人们按照意义的赋值与框架的边界来认识和理解目标域的概念或事物。由此,“隐喻→概念→思维与行动”形成了一个依次递进的认知模式,这正是隐喻的认知本质。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概念隐喻是一种内在无形的隐喻性思维,其具体的显现需要借助于各种隐喻表达(metaphorical expression),因此隐喻的意义输出还是一种自然且隐性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隐喻因其自身带有的一种逻辑性的、软性且强制的力量而成为布尔迪厄所谓的“象征权力”(symbol power),尤其适合于环境修辞的建构。

如前所述,目前环境修辞领域对于隐喻的关注还相对缺乏。为数不多的讨论主要指向三个方面:一是将隐喻视为一种修辞策略,在建构修辞理论或分析修辞实践时有所涉及。比如刘涛针对气候传播提出了一个由“意指概念”“语境”“隐喻”“意象”和“接合”等五种修辞形式共同搭建的理论框架^[15]。郭小平在分析“漂绿”广告时,将绿色隐喻作为了一种修辞策略加以讨论^[16]。二是立足于隐喻的意义生产机制,讨论各种环境意义是如何产生的。通过实验法,程泉发现绿色之所以能对人们的环保行为产生影响正是基于隐喻这一心理机制^[17]。笔者的《环境传播的修辞机制》也属这一范畴。第三是从类型学的角度,对环境文本中暗藏的各种隐喻进行归纳。比如伯奇认为美国历史上存在的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范式本质上是隐喻的,并将这些美国式隐喻概括为三种人类形象:“粗犷的个人主义者”“自耕农”和“先验论者”^[18]。约翰·德莱泽克指出环境政治领域的话语建构经常征用“太空船”“中世纪村庄中的公共牧场”“机器”“有机体”“人类智力”“战争”“母亲”等七个关键性隐喻^[19]。而布赖恩·科菲通过研究西方国家的环境政策,发现“自然资本”“自然资产”“生态系统服务”“生态债务”已成为颇为典型的经济隐喻^[20]。此外,在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中,也会较多谈到自

^①这“五艺”分别是“发明”(invention)、“谋篇”(disposition)、“文采”(elocution)、“发表”(delivery)和“记忆”(memory),它们也构成了西方修辞学的五大研究领域。

然与女性之间的隐喻问题。比如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一书中概括的两种隐喻：“地球母亲”和“自然女巫”。前者是将自然的生命化育功能和女性作为母亲的养育特性联系在一起，后者则意指自然在灾害中表现出的野性和无序类似于女性的任性和淫荡^[21]。加拿大著名生态女性主义者泽珀拉·伯曼则指出父权制和等级制对自然和女性的对象化和“强暴”是通过“土地的强暴”“处女森林”“地球母亲”和“该亚”等隐喻实现的^[22]。至于国内，林芸以《人民日报》《纽约时报》等六份中美主流报纸在2014利马气候变化大会期间的相关报道为分析语料，对其中所使用的概念隐喻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并指出媒介关于“气候变化”的隐喻包括“气候变化是一场灾难”“气候谈判是一个物理移动过程”等^[23]。

由此可见，从隐喻视角关注环境修辞，对不同环境文本中的概念隐喻进行提炼与概括是较具代表性的一个维度。但这些研究基本集中于国外，国内基于本土实践的实证考察还非常欠缺。唯一能找到的林芸的这篇文献，由于基本是语料的呈现，对所归纳的隐喻的讨论并不充分。有鉴于此，本文对2018年优秀生态环境宣传文本展开隐喻维度的讨论，就打算从类型学的角度切入，归纳阐释其中那些常见的概念隐喻及其同环境议题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分析这些环境隐喻建构的历史-文化逻辑。最后，尝试从研究中发现对环境修辞的隐喻研究做一些理论思考。

具体来说，本文的隐喻分析主要借鉴语言学中的相关方法。卡梅伦和劳把隐喻分析概括为三个阶段：①收集文本或会话中的隐喻例证；②从这些例证中概括出它们代表的概念隐喻；③进一步依据上述分析推导出构成或制约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思维模式（也就是概念隐喻得以建构的语境）^[24]。而按照查特里斯-布莱克对批评隐喻分析^①的讨论，批评隐喻分析同样包括三个步骤：隐喻识别（metaphor identification）、隐喻阐释（metaphor interpretation）和隐喻解释（metaphor explanation）^[25]。可见，隐喻分析类似于费尔克拉夫提出的批评话语分析的三步骤：描述、阐释和说明^[26]。这也表明，尽管对隐喻的分析依赖于语料，但仍需研究者结合语言、语用、认知等层面进行甄别。也就是说，隐喻分析中必然嵌入有研究者这个变量。

因此，遵循隐喻分析的思路，本文在具体操作上首先对409个环境文本中的隐喻进行识别。即辨别文本中是否存在隐喻。主要是通过辨识文本中的词语或形象^②是否存在意义上的不和谐之处，并结合语境判断其意义是字面性的还是隐喻性的^[27]。然后，归纳概括出其中体现的概念隐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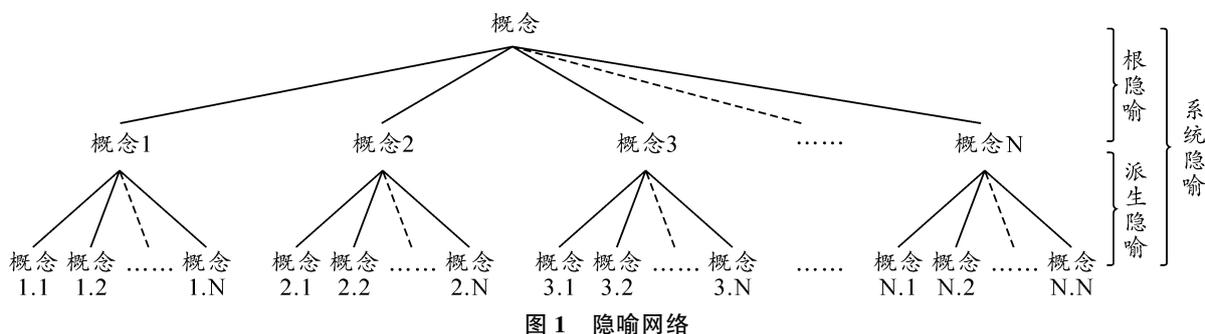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莱考夫和约翰逊对隐喻的进一步阐释，任何隐喻对概念的建构都只能是部分的，而非全貌，因此隐喻必然具有系统性^[12]。也就是说，在隐喻中，映射某一特定目标域概念的源域概念一定是多样的。同时，如前所述，任何概念的建构和认识都是基于隐喻，因而源域概念也需借助其他概念才能理解。这个时候，源域成为新的目标域。由于这些不同的隐喻之间具有层级上的上下位关系，从而构成了一个不断拓展的隐喻网络——这也就是卡梅伦和马尔森所谓的“系统隐喻”，即与相同话题或子话题相关的一系列源域集合^[28]。其中，既有作为上位隐喻的根隐喻（radical metaphor），也有基于合理的隐喻推理（metaphorical inference）从根隐喻中发展出来的次级隐喻范畴，也就是派生隐喻（derivative metaphor）（图1）。受此启发，本文除遵循传统的隐喻分析路径外，还将以图1为参考，对概括出的概念隐喻同时阐释其中的根隐喻及其派生隐喻，并就这些隐喻同环境议题的关系性进行适当分析。

最后，在展开具体分析前，还需说明几点：一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图1这样一个隐喻网络是没有终结的。但在作者看来，通过对第一层级的派生隐喻的阐释已足以较清楚地理解其上位根隐喻。二是对派生隐喻的讨论本文参考了不少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但由于本文聚焦的是环境隐喻的意义建构，以及篇幅上的限制，无法在文中具体呈现这方面的论证语料。三是按照上文提到的卡梅伦和

①批评隐喻分析（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是查特里斯-布莱克在2004年提出的一种隐喻分析方法，旨在综合运用批评话语分析、语料库分析、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析隐喻。实则是隐喻分析的一种新的补充方法。

②之所以要分析形象，是因为本文讨论的环境文本还涉及图片和影像。

马尔森的观点,隐喻网络的系统性是由源域决定的,而目标域是个相对稳定的概念。以本文为例,这些环境隐喻的目标域都是环境及其相关议题。因此,本文的隐喻提炼凸显的是源域的概念或事物。



二、2018年优秀生态环境宣传获奖文本的隐喻解读

依据前文提及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结合对409个环境文本的反复阅读,本文提炼出七个关键性的概念隐喻,即绿色、战争、动物、疾病、死亡、家、国。笔者认为,这七个关键性的概念隐喻一方面能够较好凸显这409个文本中可能的主要隐喻,另一方面也能与既往的理论话语和方法实现较好地衔接。当然这样的提炼难免具有主观性,这也是作者用“解读”来表述的原因。但是所有的判断均以文本作为依据,并非完全是笔者的主观臆想。而且,正如上文已指出的,隐喻分析方法本身就依赖研究者的识别、概括和阐释。下面将进行具体说明。

(一) 绿色

按照认知语言学家朗加克的观点,作为源域的色彩域同时间域、空间域、情感域一样,是语言中最基本的认知域之一^[29]。而获奖环境文本中出现频率最高,也是最易辨识的颜色隐喻就是绿色。比如文本13^①中这幅中国植树节海报,植树成林的意涵完全经由海报中成片的绿色生产。宣传语“植下一棵树,收获万点绿”则更为明确地从文字上将树木隐喻为绿色(图2)。此外,作者曾统计了33件(套)环境文本中所有图片和影像文本^②,但凡涉及自然之物的呈现,都基本用到了绿色来表达“颜”外之意。特别是在以孩子为创作主体的文本25和文本29中,更是典型。

一般而言,绿色的派生隐喻有:①植物。自先秦伊始,绿色就用来形容植物的叶子,比如《楚辞·橘颂》中有“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的诗句。上文提到的文本13即是此例。②生命。在古代中国,绿色隶属于青色^③,而青在五行中属东。东方太阳升起,滋养万物,因此青色历来主春和主生。也就是说,绿色代表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量。③环保。现在,绿色已成为世界公认的环保标准色,“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绿色生活方式”也成为多数人耳熟能详的环保理念。

应该说,这三个派生隐喻共同以提喻^④的方式将绿色与自然联系起来。因而,绿色隐喻本质上是一种田园话语,能够在自然图景的描绘与展演中诱发人们对于自然的想象性呈现和美好感知,进而促发自觉的生态实践。与此同时,对自然的审美感悟和精神愉悦还能唤起人们一种“重返自然”的意识。正如约翰·汉尼根所言,现在,“返回自然”不仅已成为“城市工业社会以及与城市工业社会有关的社会病和环境病的对应物”,而且也代表着“一种更有益于身心健康价值”^[30]。可见,绿色隐

^①为表述的简洁,本文以附表中的文本序号来代称具体分析文本。同时有多个子文本的文本仅以母文本的序号标注,不再细分。

^②统计中也包括以绘画形式表达的图书和读物。

^③青色是古代五色之一。五色是指青、黄、赤、白、黑。同时,青并不是表示某一种具体的颜色,而是一些色彩的集合。其中就包括有绿色。王逸在对“绿叶素容”进行注解时就写道:“绿,尤青也”。

^④提喻是指整体与部分之间或种与类的互相替换。如前所述,在辞格的发展过程中,提喻已被隐喻收编。

喻还成为人们反思和审视现代性的一剂有益良方。

(二) 战争

战争是一个高频出现在环境文本中的概念隐喻。仅以33件(套)作品的名称为例,“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文本3;文本17)、“筑梦蓝天我是行动者”(文本12)、“不买卖,不杀害,我是行动者”(文本15)、“拯救河神行动”(文本26)、“保卫青海蓝”(文本31),便都是环保是战争这一概念隐喻的隐喻实例。再如文本18中,廊坊市开展的治霾行动同样被隐喻为一场战争:霾头的出场是为了报复;霾家族如何向人类开战;人类如何将霾家族打得落花流水;霾家族又是如何卷土重来与反攻;廊坊市为什么是治霾的重点战场……同时,在介绍治霾措施时,“领导人亲自挂帅”“蓝天行动”“围剿行动”“百日攻坚”“阵地战”“游击战”“攻坚战”“媒体宣传战”等一系列与战争有关的隐喻表达频繁呈现。

将环境保护或治理隐喻为战争,显然是源于战争的一些基本元素,比如意图、战场、交战双方、结构(对峙、防守、进攻)、结果等,映射到环境议题或行动中便是相应的目的、范围、参与主体、过程、效果等。因此,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是,这样的分析仅是基于战争与环境的普遍性关联。在中国语境下,战争隐喻又可推衍出以下一些特定的派生隐喻:①记忆。在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战争是大约4000年前的黄帝蚩尤涿鹿之战。此后,战争就一直伴随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②正义。尽管中国有着漫长的战争史,但国人的战争记忆还是多停留于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战争。由于这些战争寻求的是民族独立、解放,或致力于维护民族主权、尊严,因此战争成为正义的化身。③民族精神。纵观近现代以来的多次战争,尽管代价沉重,但战争中也很好地诠释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

在笔者看来,记忆的延续性使得战争已经幻化为国人一种普遍的认知心理,并常常以这种战争思维来认识和处理社会各个领域的事物。就环境议题而言,由于人们习惯于将紧迫的工作理解成为一个军事行动,于是战争隐喻首先凸显出环境问题的迫切性。同时,再配合正义和民族精神隐喻所激活的集体情感,无疑可以促使国人以一种昂扬的战斗激情投入到环保实践之中,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

(三) 动物

除了将环境隐喻为绿色,获奖环境文本也有不少将环境隐喻为动物。以文本13中这幅“世界海洋日”的海报为例(图3),海洋作为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意义,是借由画中的海豚表征出来的。图4关于“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海报同样如此。动物与生态环境之间映射关系的建立,是因为动物多样性构成了生物多样性,而生物多样性又是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组成因子。

透过这些环境文本,笔者认为,与动物隐喻相关的派生隐喻有:①共生。这是因为,自原初社会起,人便和动物生活在一起。②吉祥。总有一些特定的动物会更频繁地出现在获奖文本中,比如大象、老虎、犀牛、鹿、鹤等。而这些动物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多是吉祥、喜庆的征兆。③朋友。这个派生隐喻显然源于一句习惯性隐喻表述“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比如文本13中“世界动物日”海报的配文即是“动物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愿所有生命都被温柔以待”。而图5是文本17系列海报的一幅。尽管海报中只有两只在湿地觅食的丹顶鹤,并没有出现人类形象,但众所周知,在中国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与丹顶鹤有关的故事——这就是1987年,在江苏盐城,一个年仅23岁的女孩徐秀娟为寻找走失的丹顶鹤而不慎溺水身亡。那首流传甚广的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根据其事迹创作而成。因此,丹顶鹤的出场必然伴随着对这个护鹤牺牲的故事的邀约,从而在文本及其伴随文本共同搭建的意义框架中实现朋友这一派生隐喻的生产。

动物隐喻的三个派生隐喻共同指向了一种威尔逊所言的“亲生命性”(biophilia)体验。也就是人类在漫长的时间中发展出的一种深植于基因中的、渴望与其他物种相伴的信仰。威尔逊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叙事”,能指导人们去重新思考和界定人和物、人和人的关系^[31]。因此,无论是共生隐喻通过将人类拉回原始生活经验中,还是吉祥隐喻唤起人们对动物的喜爱之情,以及朋友隐喻所激活

的以己度物思维,意欲搭建的都是人和环境及其构成生物之间一种和谐亲善的状态。根据王和巴索的研究,通过友谊隐喻“动物是朋友”将肉食动物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确实可以改变消费者对肉食的态度和行为意向,诱发对动物的负罪感^[32]。可见,这种“亲生命性”的召唤在环境意义的建构中尤其有效。

(四) 疾病

不少环境文本都习惯将环境问题表述为“她生病了”。比如文本 26 就将整个故事置于河神生病—河神看病—寻找病因(水污染)—对症下药(垃圾清理;淤泥清理;底泥处置;改善黑臭河两岸生态环境)这一架构之下。此外,文本 30 中的诗歌“为母亲河疗伤”同样是将昆明人的母亲河——滇池隐喻为病体。囿于篇幅限制,这里仅摘录诗中第六小节加以说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母亲湖生了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母亲湖受了伤/黑水玷污了她美丽的容妆/刺鼻的臭气使人们唯恐避之不及/湖面上漂浮着的是垃圾、塑料袋和断了桅杆的帆”。

其实,美国著名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曾在《疾病的隐喻》中对一些常见的疾病隐喻进行过概括:①死亡。疾病被普遍看作是死亡的同义语,因而是一种不详和令人厌恶的征兆。②惩罚。在古代世界,人们对疾病的思考,大多是把疾病当作上天降罪的工具^[33],或是鬼神的附体。③失序。在桑塔格那里,失序主要是针对国家社会层面,病体成为诠释乱世的重要表征:“疾病意象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在政治哲学的主流传统中,把国家失序类比为疾病,是为了以此来敦促统治者追求更为理性的政策”^[33]。而按照中医对疾病的认识,疾病是人体五脏六腑失去了平衡,进而人与环境之间出现了不相适应的状态^[34]。可见,结合中国语境,失序还有更进一层指向,这就是人本身。

应该说,疾病的三个派生隐喻共同以“诉诸恐惧”的修辞论证方式完成了环保话语的逆向建构。其中,死亡和惩罚隐喻意欲提醒人们无节制的“人化自然”终将把人推向“自然人”的黑暗深渊。而失序隐喻则鲜明地指出了现代环境问题的症结:正是源于人自身的失序(比如人的精神感和道德感不断丧失;自然被人彻底对象化),以及现代社会的失序(比如社会的畸形增长;无节制的生产与消费欲求),才最终引发了环境的退化甚至崩溃。

(五) 死亡

与疾病相关的隐喻是死亡。比如文本 21 的海洋里有大量死鱼、骷髅头,海水的颜色也是黑色的。这些都是对大海已死的有力宣认。而文本 11 同样把长江描绘成灰黑色,并有大量死鱼漂浮其中。此外,文本 14 中赫然矗立着“快倒下的濒危动物墓碑”和“已灭绝的动物墓碑”。再来看图 6(出自文本 15),从构图看,大象只露出一半的身体,另一半身体完全被黑色覆盖。海报所传达的,正是以大象为代表的珍稀动物正处于死亡的笼罩下。因为,在我国,黑色在五行中代表北方,而“北方的黑色属冬……(冬)万物凋谢,带给人的只是悲叹和哀伤”^[35],因此,黑色往往意味着死亡或祭祀。

作为一个根隐喻,与死亡相关的派生隐喻有:①恐惧。岳小国指出,在中国的文化认知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对尸体怀有一种恐惧、逃避、忌讳心理”^[36]。②禁忌。正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死亡成为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于是,从古代到现代,人们发展出一套委婉语来代称死亡,以此满足社会习俗的避讳要求^①。③平等。尽管在古代中国,儒家所倡导的那套宗法等级制度存在着严格的尊卑差别,但古人也意识到,人在死亡面前是无等级之分的。在古代思想家对死亡的思考中,无论是庄子的“气散”“物化”,还是孔子的“数尽”,抑或是范缜的“神灭”,都能体现这种独到的见解。

同疾病隐喻一样,死亡隐喻的话语输出仍是“诉诸恐惧”的逆向路径。应该说,前两个派生隐喻同恐惧的关系显而易见,比较难理解的是平等这个看似正向的派生隐喻。事实上,平等隐喻使人很容易想到的便是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对风险的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尽管贝克承认,“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总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是颠倒的方式:财

^①根据龚延明、吕友仁等人的研究,古代用于表达死的别名共有 253 个。张拱贵则统计了现代汉语中表示死的委婉词,多达 481 条。

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37]。但是,他也指出,这种制约是指一定时空下具体的风险分配;就终极分配而言,风险是平等的。这就是他那句著名的论断:“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37]。也就是说,风险可以击穿国家、民族、阶级、性别等任何一层界限,风险社会既不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分期概念,更不指向某一特定的国家或人群,相反,它已成为当下人类所处的时代危机的形象描绘。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隐喻通过与风险社会的勾连成为了最有力的恐惧呈现方式。

(六)家

家隐喻主要是指一些环境文本往往在家和环境之间建立起映射关系。文本 25 中的这首小诗“美丽的海之家”：“曾经,我们拥有一个美丽的海之家/可是后来,世界的发展造成了海洋污染/善良的人们发现了问题,开始为我们保护海之家/如今,海之家还像从前一样美丽”便是一例。而根据作者的统计,文本 30 的 81 篇诗歌和散文中,仅直接从标题表述中就能识别出家隐喻的就有 16 篇,包括“找回梦中的家园”“保护滇池,就是保护我们的家”“美丽的家园”“圣洁的母亲湖”“母亲·湖”等,占比约 20%。

家的派生隐喻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①庇护所。在《说明解字》中,家原本是关猪等牲口的地方,后引申为人居住之所。同时,家又是“稼”的通假字。因此,家不仅是住所,还能为人提供牲畜、粮食等生活必需品。②血缘。与家相关的另一个通假字是“嫁”,说明家既由人构成,同时人之间还有一定的血缘姻亲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个体家庭是过渡并转换于氏族家庭,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血缘宗亲特征。③国。在日常表述中,家和国经常是连缀成义的,国是家的延伸。这源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关系是一种以伦理秩序为核心的家国同构制度。

在卡顿和邓拉普提出的“环境的竞争性功能模型”中,环境具有服务于人类的三种总体功能:供应站、居住地和废料库^[30]。可见,庇护所隐喻对应的正是环境对人类的服务功能。也就是说,环境对人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而血缘隐喻凸显出家的一体性、共生性及亲密感。因此,将环境保护同家联系起来,无疑可以激发出强烈的情感认同。至于国隐喻,则可以使人们在对家和国的双重认同^①^[38]中进一步诱发情感共鸣。

(七)国

国隐喻是一个与家隐喻密切相关的隐喻。比如文本 12 中“保护环境,治理雾霾,同样是为国争光”的表述就将环境保护隐喻为为国争光。而文本 16 中的四幅系列海报主要征用了自然符号和国家符号(图 7 是其中一幅)。其中,自然符号包括蓝天、青山、良田、大雁;国家符号则有天安门、五星红旗、人民大会堂、万里长城等。这里,自然符号原本的意义在国家符号的“锚定”中形成了新的语境置换,环境于是同国家联系起来。

一般而言,家和国之间是一个可以互相投射的概念。也就是说,“国家是家庭”这个派生隐喻是讨论国隐喻的起点。这方面内容上一部分已阐述过。而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理解,国家包括领土、人民和权力三个要素。因此,笔者认为,这三个要素可以依次派生出三个隐喻:①容器。即国家是一个由海陆空等三维空间所构成的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②机器。机器隐喻说明国家是建立在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和行政机构基础之上的有机机器。③人。也就是说,国家是由个人组成而又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人的集合体^②。

由于容器确立了边界,并且是一种结构-功能的复合体,如果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事实上就是将国家隐喻为一个由不同种群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具有时间和空间位置的生态系统。自然,环境

①按照许纪霖先生在《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一书中的讨论,在传统中国社会,每一个自我都镶嵌在家国天下的共同体框架之中。也就是说,自我的存在和价值是要在家国天下这一连续体中才实现的。而尽管在清末民初自我实现了挣脱家国天下连续体的“大脱嵌”,获得了所谓的“本真性”,但也导致了无所依傍的原子化个人的出现,进而丧失了个人价值。因此,现代自我的重塑离不开将自我重新置于新的家国天下秩序之中。可见,许先生的讨论说明,由于自我的价值始终不能脱离家国共同体,因而自我对于家国的理解必然内嵌认同感、依附感和归属感。

②本文在这里基于国家概念对国隐喻的讨论还同时参考了郑卫东在《“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中国乡村研究综述》(《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2期)一文中对国家这一概念的梳理。

也是这个国家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生态位”之一。这再次凸显了环境的价值。而机器隐喻表明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国家建立起一系列行之有效且相互协调的组织和制度保障。然而,环境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有赖于关心环境、具有良好环境意识的环境主体(environmental subjects)。换句话说,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需要全体中国人共同行动。这正是人隐喻的价值所在。

关于上述七个概念隐喻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可以从莱考夫和特纳提出的“宇宙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中加以理解。宇宙巨链是依据各种概念的属性和功能特征所形成的类属层次(generic-level)。在宇宙巨链中,不同概念从高到低的排列层级是:人>动物>植物>复杂物体>自然物理事物^[39]。其中,人是反映更高阶的属性和功能的概念,比如思维、理性或智识等;动物是实体论层面的概念,也就是宇宙中的各种物种;植物是与生物属性相关联的概念,比如器官、生老病死等;复杂物体是指向结构、功能层面的概念,比如组织、系统;而自然物理事物是指投射自然、物理现象的概念,比如力、光等。可见,对宇宙巨链的认识不能简单从其字面意思出发。

就这七个概念隐喻而言,绿色诉诸感官,战争是智识的产物,两者同属于巨链中的人;动物隐喻与巨链中动物这一概念层次直接对应;疾病、死亡是人的生物特征,指向巨链中的植物类别;最后,家和国都是组织化的体系,是巨链中的复杂物体。因此,本文对这七个概念隐喻的呈现,参照的正是宇宙巨链中不同概念的层次结构。而在同一层次内部,依据的则是其在环境文本中出现的频次的多少,或是概念之间逻辑上的层递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七个隐喻的区别也仅仅体现在其概念层次的高低上,就其对环境意义的生产和环境话语的建构而言,效力并无差别。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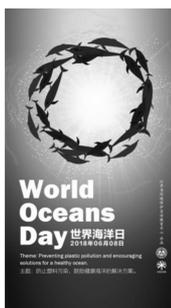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三、环境隐喻的元隐喻

如前所述,隐喻分析需要对从例证中概括的概念隐喻进一步推导其建构的语境。而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莱考夫和约翰逊指出,隐喻产生的基础在于经验主义哲学,也就是人与外在世界的互动并由此形成的各种经验。由于这些互动而成的经验就是文化,因此,隐喻的形成、理解必然与文化有关:“文化中最根本的价值观与该文化中最基本概念隐喻结构是一致的”^[12]。同样,奎因也认为,在建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方面,隐喻只是扮演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更重要的角色是文化模式^[40]。可见,要想深入阐释概念隐喻,必须引入文化的视角。换句话说,对隐喻语境的分析关键就是将其放回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土壤之中加以考察。上文所概括的环境传播中的七个概念隐喻同样需要如此。于是,本文在这里试图引入元隐喻(meta metaphor)这样一个分析概念。为此,本文将首先说明什么是元隐喻以及其中所必然含有的文化维度,从而使元隐喻/文化→概念隐喻这样一条分析逻辑显得有理可循。

(一) 建构元隐喻

如前所述,隐喻更多是体现在思维层面,需要借助于各种隐喻表达得以显现。就本文分析的获

奖文本而言,其隐喻表达便是语言和图像这两种最基本的符号形式。在符号学的研究中,语言和图像除了可以传递信息外,还具有自反性(reflexiveness),即一种自我言说、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关于语言符号,罗兰·巴特曾明确讨论过语言的自指功能(self-reference):“词被用来指定其自身,信息‘跨’在符码之上(信息\符码,M\C)。这一结构非常重要,因为它覆盖了‘阐明性解释’”^[41]。可见,在语言之上,还存在着某些“阐明性解释”。同时,语言本身就能表达出这些“阐明性解释”。这就是所谓的“元语言”(meta language)问题。在罗曼·雅各布森看来,作为元语言的“阐明性解释”是指与语言有关的“游戏规则、基础构造、编码原理”^[42]。赵毅衡则认为元语言大致分为三类:社会文化维度的语境元语言、解释者维度的能力元语言和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43]。至于图像符号,托马斯·米歇尔提出了“元图像”(meta image)这一概念加以回应。在米歇尔那里,图像就其实质而言是“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44]。他将图像中蕴藏的这套复杂的作用机制称为“二级话语”。而任何能反映图像“二级话语”的图像便是元图像。同时,他认为图像同样能够反映自身,告诉人们有关图像的东西。由此可见,元图像同元语言一样,是“跨”在图像之上的。换句话说,无论是语言还是图像,都具有自己提供和展示其“阐明性解释”或“二级话语”的能力,这正是自反性的实质所在。

因此,本文在这里借用表征隐喻的两种符号——语言和图像中对“元语言”和“元图像”的讨论,提出元隐喻这一概念,指的正是那些附着在隐喻之上,关于隐喻的隐喻。事实上,“meta”(元)置于抽象概念之前,本身就具有“关于”(about)的意思,以表达对该概念的进一步抽象^[45]。而按照上文的讨论,“元”是个相对宽泛的范畴,可以包括符号自身、再现行为、再现情境、再现者的视角和能力,以及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但对隐喻而言,由于其生成必然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有关——按照潘忠党等对“元传播”(meta communication)的讨论,这些历史-文化语境也就是具有结构性功能的,规制着每一次传播活动的展开和意义在其中的形成,并且被某一特定的社会共同体所共享的“常识”^[46],因此,本文这里所指的元隐喻主要是一种狭义的理解,也就是那些关于隐喻历史-文化本质的隐喻^①。具体来说,本文讨论的元隐喻具有以下几层意涵:第一,元隐喻同样是“跨”在隐喻之上的。换句话说,隐喻仍然具有自反性。元隐喻就是透过隐喻的自反性显露与表征出来的。因此,元隐喻既是不在场的,又是在场的。第二,元隐喻意味着任何的隐喻实践都是在多个抽象程度不同的层面同时展开。其中,第一个层面是概念隐喻本身及其所形成的意义框架,同时需要借助语言和图像等表达隐喻的载体。第二个层面则是与该隐喻相关的元隐喻。也就是那些模版化了隐喻的历史-文化常识。第三,既然隐喻就是通过一个概念来理解另一个概念,而元隐喻中所投射的是隐喻的历史-文化脚本,因此,元隐喻同样意味着通过特定的概念——在这里,就是那些历史或文化维度的概念,来理解概念隐喻。由此可见,在隐喻和历史-文化之间,同样蕴含着一个隐喻思维。这也是作者将其称为元隐喻的前提。第四,在元隐喻中,各种历史-文化概念从结构上看属于隐喻中的源域,而目标域则是隐喻本身。同时,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关性是基于历史-文化的联系。最后,元隐喻的价值在于可以理解和把握隐喻建构的历史-文化逻辑。

(二) 环境隐喻中的元隐喻分析

如前所述,元隐喻阐释的是隐喻建构的历史-文化逻辑。作者认为,有两个最基本的元隐喻推动了上述七个环境隐喻的建构,这就是问题驱动和趋利避害^②。前者指向历史语境;后者与文化土壤

^①之所以要把对元隐喻的讨论限定在一个相对狭义的范围,是因为“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范畴。以传播学对“元传播”的讨论为例:“元传播”一词最早由美国社会科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在1951年提出。当时,贝特森对元传播的讨论主要是针对人际传播。他认为传播不仅涉及第一层级的传播的内容,更涉及第二层级的传播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线索和命题。这个第二层级中的关系就是他所谓的“元传播”。此后,瓦兹拉维克进一步发展了元传播的层级性结构,并提出了元传播的五个公理。而潘忠党对“元传播”的阐释则拓展了“元传播”作为一个分析概念的适用范围。在潘忠党那里,所有经由作为中介的媒介连接的传播都存在着一个“元传播”的向度。同时,他认为媒介中“元传播”的逻辑和规则既有技术的,又有媒介的,更有社会的。并且,媒介传播中作为元传播的关系更多体现为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对元隐喻的讨论不是在本文这样一篇文章中就可以完成的。

^②如前所述,隐喻意义的凸显主要是依赖于各种源域概念,因此,作者这里对元隐喻的呈现同样聚焦的是源域的内容。

有关。

纵观这七个环境隐喻,有的是为了说明自然环境的社会价值;有的旨在自然的诗意呈现中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和生态想象;有的凸显出当下环境问题的紧迫性;有的鲜明地揭示出现代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有的则将保护环境与保护家国联系起来。尽管其各自输出的意义不尽相同,但又殊途同归地立足于一个面向——这就是解决中国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可见,正是环境问题驱动了环境隐喻的建构。

无论是贝克还是吉登斯,环境问题都被认为是现代性的伴生物。因此,要想理解作为历史元隐喻的问题驱动,需要剖析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表述,我国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47],可见,目前我国还处于现代社会的建设阶段。而如果将新中国成立作为我国自觉的现代化建设的开始,这条现代化之路也才践行了70余年。由于环境问题的显现总是滞后于现代化的步伐,甚至会被现代化的成果所掩盖,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的环境问题才逐渐显露出来,并由此开启了一条“先发展、后治理”之路。加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种“压缩型工业化”(telescoping of industrialization)^①的发展路径,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环境问题的程度:其中既有与贫困落后相关联的环境破坏与资源枯竭问题,也有诸如气候变暖、污染等与高度工业化相关联的“人为制造的风险”。因此,解决环境问题仍是当下我国对待环境议题的主要态度。

趋利避害则是上述七个环境隐喻的文化元隐喻。顾名思义,趋利避害是指国人普遍存有一种追求安定、祥和、幸福的心理愿望,并极力避免诸如死亡、疾病、灾难、厄运等不详事物。这种文化心理的形成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宗亲血缘遗风的强大和家庭式农业生产的普遍,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实用理性”原则。这套实用-经验思维不仅使得国人高度重视世俗生活及其情感体验,而且必然要和自然之间保持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从而锻造出中国文化中最为独特的“天人合一”思想。二是中国文化中又普遍蕴含着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与殷周之际巫术鬼神之风的兴盛以及王朝历史的频繁嬗变密切相关。可见,忧患意识发酵于恐惧、恶、崩溃等内容。为此,士人们将排忧解难的良方寄予人自觉的道德属性和道德实践。在儒家那里这便是一套以“仁心”和“善性”为核心的道德伦理学说。

在绿色和动物隐喻中,无论是花草树木,还是寓意吉祥的动物,本身就是能带给人精神愉悦之物。同时,绿色隐喻致力于拉近人对自然的认同距离,动物隐喻旨在使人意识到宇宙万物同人类一样所具有的生命体特征,可见,这两个隐喻中都蕴含着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因此,其体现的正是趋利避害这个元隐喻中趋利的一面。而疾病隐喻和死亡隐喻是以“诉诸恐惧”的方式逆向生产环保话语,其文化喻底^②又是避害这一面。此外,无论是家隐喻还是国隐喻,都是意图将保护环境与保护家、国联系起来,从而在情感共鸣与家国认同中实现说服。按照前文的讨论,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建立在儒家所倡导的一套严苛的道德伦理秩序之上。而这套道德体系正是在忧患意识所强调的道德属性和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终极指向上,家、国隐喻的建构同样可以从避害这一文化心理中理解。最后,由于对战争隐喻的征用是为了将战争思维映射到环境行动中,这个隐喻本质上体现出一种亲自然的思想,因此,其文化逻辑仍是基于趋利原则。

四、隐喻环:基于研究发现的进一步讨论

在前文的内容中,本文对2018年生态环境宣传获奖文本中的隐喻进行了识别,从中概括出七个概念隐喻,并对其派生隐喻展开分析,从而明确了这些不同环境隐喻的意义生产。在此基础上,借助元隐喻这个分析概念,阐释了隐喻建构的历史-文化逻辑。由此可见,在隐喻研究中,是存在着一个

^①“压缩型工业化”(telescoping of industrialization)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开发署环境专家康纳在研究东亚的环境问题与经济的关系时提出。因此,这是一个与现代化理论有关,特别是与后进国家的现代化理论有关的概念。

^②在修辞学中,喻底是指隐喻中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本文在这里借用这种表述,指向隐喻得以生成的文化基底。

由元隐喻、根隐喻、派生隐喻等不同层次的隐喻所构筑的隐喻体系的。由于这三种不同的隐喻之间呈现出依次递进、波纹状扩展开来的环形结构,于是基于研究发现,作者尝试提出隐喻环这样一个环境修辞研究的新命题。

从图8中看出,对隐喻环的理解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

一是作为形式的隐喻环。也就是一个从内到外,由元隐喻、根隐喻、派生隐喻这三个不同类别的隐喻构成的隐喻体系。其中,元隐喻作为环境隐喻的文化喻底,直接铺设了根隐喻和派生隐喻运行的语法规则,由此构成这个隐喻环中的根本性存在。根隐喻是环境隐喻中的关键性隐喻,或者也可称为基础隐喻。也就是当我们将境议题同隐喻结合起来时会首先想到或征用的隐喻。因此,根隐喻从某种程度类似于荣格所谓的“原型”,即一种“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但又是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存在^[48]。同时,根隐喻会因主体、目的、

议题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建构。这些不同的根隐喻从各自的维度出发,为环境议题的意义赋值限定了一个整体的框架。但是,由于根隐喻本质上是思维性和隐匿性的,其意义的显露还需依赖派生隐喻的再现。派生隐喻一方面使得对其上位根隐喻的理解更加明确,另一方面直接将根隐喻同环境议题之间的关系性揭示出来。因此,在环境隐喻中,真正实现并决定环境意义建构与生产的,其实是派生隐喻。

在作者看来,作为形式的隐喻环为环境修辞研究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就理论层面而言,如前所述,既往的研究基本是将隐喻和文化置于两个不同的面相进行讨论。而在隐喻环中,文化是以元隐喻的方式存在的。换言之,文化也可以从隐喻的维度进行理解。同时,由于隐喻环中还特别强调派生隐喻这个层次,环境意义的建构变得明确和有针对性。这些无疑都丰富了隐喻本身的内涵与实质,从而可以提升隐喻作为环境修辞研究一个必然向度的合理性和解释力。而在实践层面,它为环境修辞研究提供了一条简单、具体、易行的操作路径。也就是说,后续的环境隐喻研究便可按照本文的分析思路展开。

二是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而填充进这个隐喻体系中的具体的、各个层次的隐喻,也就是作为内容的隐喻环。这样一个维度无疑可以弥补国内现有研究中缺少类型学视角的遗憾。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的读解面向的是特定的环境文本,其结果一定是语境化的。这就意味着,作为内容的隐喻环一定是生成性、流动性和拓展性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基于不同的环境文本,隐喻环中的内容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当然,也有可能不会出现和本文相同的隐喻建构。另一方面,又可以把不同环境文本的研究发现共同置于这个隐喻环之内,从而逐步建立并完善一个关于环境隐喻的知识图谱,进而去发现环境修辞中隐喻建构的基本面貌与特征,甚至以此为基础形成一些中西的比较。因此,本文的讨论仅仅是为这个隐喻图谱的建立开了一个头,还有待后续文本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从而不断补充、扩展。

五、结语

笔者采取文本和理论互构的研究思路,首先基于对2018年生态环境宣传获奖文本这样一个特定案例的隐喻识别和解读,回应了当下环境修辞研究中存在的隐喻“盲点”。同时,正是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本文意识到环境修辞中的隐喻并非是一个单一的结构层次或概念,而是一个由元隐喻、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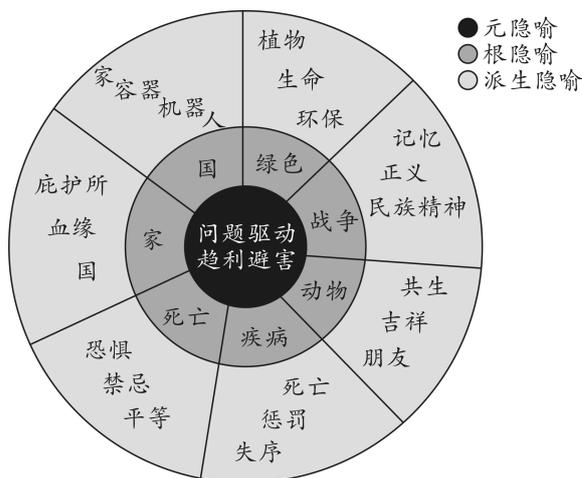


图8 隐喻环

隐喻、派生隐喻等相互关联的隐喻共同搭建的隐喻体系。于是,本文尝试提出隐喻环这样一个新命题并从形式和内容两个维度对其进行阐释,以期对这个隐喻体系的多层次性进行回应和总结。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环境修辞研究的发展。

同时,在本文对409个环境文本的分析中,作者也发现不同的创作主体存在着隐喻建构的不同偏向。比如战争隐喻是一个最易被官方话语收编的隐喻。而青少年和儿童创作的环境文本更倾向于使用绿色隐喻、动物隐喻和家隐喻。如果从逆向的角度来思考,恰也表明环境传播中的隐喻建构还需考虑不同受众的隐喻认知。然而笔者却发现,尽管这些获奖文本已经意识到环境传播存在城市与农村的地域差异,并针对农村地区制作了专门的环境文本,但这种差异也只是文本形式输出的不同(比如专门针对农村的戏剧、曲艺),而在文本的隐喻建构上并无明显区别。换句话说,当下基础的环境隐喻仍被置于城市性的宰制中。而根据作者在农村地区的田野调查,农村环境意识的建构相当程度上建立在环境利益的可得性上,因此针对农村的环境隐喻显然应当考虑这一独特的逻辑。这些进一步的发现,无疑成为本文在文本分析和理论建构之外,为环境修辞的现实观照和落地实践提供的一些额外线索和启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隐喻分析本身具有主观性,但当下语言学的研究正在力图通过语料库的方法来提升隐喻分析的科学主义色彩。这也是本文的缺憾和后续应该努力的方向。但是,笔者也认为,对于修辞这样一门本身就渗透着强烈的艺术想象和个性特色的学科而言,或许,这种人文倾向的解读倒反更能凸显隐喻独特的价值与魅力。

附表 2018年优秀生态环境宣传获奖文本

序号	产品名称	类别	数量	制作/编著单位	备注
1	12369 环保热线	宣传片	1	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	
2	1=?	宣传片	1	江西省上饶市环境保护局	
3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2018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宣传片之一	宣传片	1	湖南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4	环保就在点滴之间系列片《爬山侠》	宣传片	1	四川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5	环保就在点滴之间系列片《环保张》	宣传片	1	四川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6	无塑黄金海岸	微视频	1	大连索菲印象传媒有限公司	
7	科普 PM2.5 宣传动画	微视频	1	安徽省亳州市环境保护局	
8	《大气污染与控制》科普宣传动画片	微视频	1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	
9	因你美丽	微电影	1	本溪市生态环境局	
10	弯路	微电影	9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环境保护局	
11	重生	微电影	1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	
12	“筑梦蓝天我是行动者”主题海报	海报	10	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	
13	环保相关节日电子海报	海报	15	江苏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14	保护生物多样性科普宣传系列	海报	13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研究院	
15	《不买卖,不杀害,我是行动者》系列	海报	3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研究院	
16	2018年六五环境日主题海报系列	海报	4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	
17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海报	海报	5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	
18	如果“霾”会说话	漫画	1	廊坊市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	
19	净说环保系列漫画	漫画	1	江苏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续表

序号	产品名称	类别	数量	制作/编著单位	备注
20	企业环境违法典型案例漫画集	漫画	1	江苏省宿迁市环境保护局 宿城分局	
21	我不想再经历一次生离死别	手机 H5	1	江苏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22	【渝小环】环保 H5 小游戏	手机 H5	1	重庆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23	图说《2017 环境状况公报》	手机 长图	1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上海市 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24	种子力量	MV	1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等	
25	《绿色梦想美丽世界》——大连国际少儿 环保四联漫画大赛作品集萃	图书	200	大连市环境宣传教育中心	
26	《拯救河神行动》	图书	1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	
27	《环境教育》	图书	1	河南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小学环保 教育教材
28	上海常见湿地水鸟绘本	读物	1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上海市 环境科学研究院	
29	云南省 2018 年中学生环保绘画 优秀作品集	读物	27	云南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30	《滇池歌·春城梦—我和滇池有个约》昆 明市中小学生环保主题诗会获奖作品选	读物	81	昆明市环境保护局	诗歌 60 篇, 散文 21 篇
31	保卫青海蓝	读物	20	青海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诗歌
32	罚公公	戏剧	1	山东省冠县环境保护局	
33	秸秆焚烧系列快板书	曲艺	1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	
合计			409		

参考文献:

- [1] 生态环境部. 关于公布 2018 年优秀生态环境宣传产品评选结果的通知. 环办宣教函[2019]383 号(2019-04-15).
- [2] M. Foucault.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80.
- [3] 刘亚猛. 追求象征的力量: 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2.
- [4] 罗伯特·考克斯. 假如自然不沉默: 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第三版). 纪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21-22; 71; 168.
- [5] 王丽娜. 环境传播的修辞机制.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
- [6] K. M. Deluca. Image Politics: The New Rhetoric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m. Mahwah, NJ. : The Guilford Press, 1999.
- [7] S. Schwarze. Environmental Melodrama.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2006, 92(3): 239-261.
- [8] 刘涛. 视觉抗争: 表演式抗争的剧目结构与符号矩阵.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7: 5-15.
- [9] 刘涛. 身体抗争表演式抗争的剧场政治与身体叙事.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7, 1: 62-67.
- [10] 刘涛. 接合实践: 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 58-68.
- [11] 刘涛. 隐喻论: 转义生成与视觉修辞分析.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7, 6: 140-148.
- [12] 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何文忠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1-3; 4-10; 20.
- [13] G. Lakoff.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s//A. Ortony. Metaphor and Though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3.
- [14] 阿瑟·A. 伯格. 写给传媒、传播、文化研究专业学生的课堂游戏. 秦洁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8.
- [15] 刘涛. 新社会运动与气候传播的修辞学理论. 国际新闻界, 2013, 8: 84-95.
- [16] 郭小平, 李晓. 环境传播视域下绿色广告与“漂绿”修辞及其意识形态批评.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

- 1:149-156.
- [17] 程泉. 绿色对环境保护的影响:来自颜色隐喻的证据. 南京: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2019-11-16]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802&filename=1018150448.nh&v=MjA4MjI0WElwNUVhUElSOGVYMUx1eFITN0RoMVQzcVRyV00xRnJlDVVJMT2VadWRwRnlybFVzM01WRjI2RnJLOUg=>.
- [18] W. R. JR. Burch. *Daydreams and Nightmar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 [19] 约翰·德莱泽克. 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 蒯雪春,郭晨星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16-17.
- [20] B. Coffey. Unpacking the Politics of Natural Capital and Economic Metaphor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Discours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16, 25(2): 203-222.
- [21] 卡洛琳·麦茜特. 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 吴国盛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1-49;140-164.
- [22] 泽珀拉·伯曼. 自然母亲的强暴? ——环境话语中的女性. 赵奎英译. 鄱阳湖学刊, 2012, 4:119-128.
- [23] 林芸. 中美主流报纸中的隐喻和环境形象构建——以气候大会期间对“全球变暖”议题的报道为例. *中国报业*, 2016, 4:42-45.
- [24] L. Cameron, G. Low.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 Cambridge: CUP, 1999:88.
- [25] J. Charteris-Black.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34-43.
- [26] N.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1989:16-17.
- [27] 纪玉华,陈燕. 批评话语分析的新方法:批评隐喻分析.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6:42-48.
- [28] L. Cameron, R. Maslen. *Metaphor Analysis*. London: Equinox, 2010:128.
- [29] R. Langacke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150-154.
- [30] 约翰·汉尼根. 环境社会学(第二版). 洪大用等译. 肖晨阳主校.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0;19.
- [31] 大卫·铃木,阿曼达·麦康纳. 神圣的平衡. 何颖怡译.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180-181.
- [32] F. Wang, F. Basso. “Animals Are Friends, Not Food”: Anthropomorphism Leads to Less Favorable Attitudes toward Meat Consumption by Inducing Feelings of Anticipatory Guilt. *Appetite*, 2019, 138:153-173.
- [33]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51;81-86.
- [34] 徐云生. 从中医症、证、病的概念谈辨证与辨病的关系. *医学与哲学*, 2005, 1:65-66.
- [35] 唐振华. 符号学与“颜色词”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运用.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6, 3:75-81.
- [36] 岳小国. 污染与洁净:三岩藏族丧葬文研究. *民族研究*, 2015, 5:61-70.
- [37]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何博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6;38.
- [38] 许纪霖. 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16.
- [39] G. Lakoff, M. Turner.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172.
- [40] N. Quinn. *The Cultural Basis of Metaphor*. Los Angel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101.
- [41] 罗兰·巴特. 符号学原理. 王东亮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2.
- [42] R. Jakobson.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T. A. Sebeok.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 A.: MIT Press, 1960:356.
- [43]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33.
- [44] W. J. T. Mitchell. *Picture Theory: 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16.
- [45] 王金礼. 元传播:概念、意指与功能.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 2:118-125.
- [46] 潘忠党,陆晔. 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 *国际新闻界*, 2017, 10:91-124.
- [4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10-18). [2017-10-27] http://politics.gmw.cn/2017-10/27/content_26628091.htm.
- [48] 荣格. 荣格文集. 冯川译.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10.

Metaphorical System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ward Text of 2018 Excel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ublicity as well

Wang Lina (Yunnan University,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rhetorical orientation becoming a significant and core field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ow to use rhetorical theories to carry out researches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fo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Because the metaphor has long been the center of the knowledge map of rhetoric, and the research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has raised the metaphor to a cognitive proposition to further release its academic explanatory power, the metaphor has become a feasible and appropriat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ocuses on metaphors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award text of 2018 excel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ublicity selected by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this paper identifies and extracts seven key conceptual metaphors: green, war, animal, disease, death, home and n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explains the derivative metaphors of these environmental metaphors, from which the environmental meaning pro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value of different metaphors can be seen. Furthermo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meta metaphor to analyz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metaphor. Therefore, this paper holds that metaphor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is actually a metaphorical system built by meta metaphor, radical metaphor and derivative metapho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multi-level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metaphor system with the new proposition of metaphor ring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rhetoric research.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conceptual metaphor; metaphorical system; metaphor r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ublicity

■收稿日期:2019-12-17

■作者单位:王丽娜,云南大学新闻学院、西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责任编辑:汪晓清